

上政局動盪，所以無法在1949年前把婦女分娩標準化。作者因此歸結出民國時期的現代化分娩只局限於城市地區，而這幾位醫生的願景，在沒有政府的實際支持下難以實現。事實上，當時國民政府亦面對各種問題，改善國民健康既非政府首要處理的問題，政府高層對如何促進國民健康亦無共識。

最後的總結，作者簡述從抗日戰爭到千禧年間，不同時期的政府仍延續分娩現代化（或控制個人身體）的方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致力改善婦嬰健康，控制婦女生育，不同的是中共政府並未完全否定傳統接生婆的價值。當政府在城市大力推動現代化生育革命，農村地區的婦嬰健康就由赤腳醫生和接生婆負責。始終中國是幅員廣闊的國家，分娩現代化不能一下子完成。如此看來，自1920年代開始，中國婦女的分娩一直被置於非人性化、科學化的脈絡下發展，不論是為誕下健康嬰兒，還是控制國家人口增長，婦女的身體和感受往往被國家及社會所忽略。

本書雖然討論婦女切身的問題——分娩，但從頭到尾也看不到多少婦女的個人經歷或意見。作者多次引用楊崇瑞的個人回憶及其對中國婦產科的建議，但除此之外，書中卻找不到產婦、助產士以至接生婆的聲音。縱然民國時期大部份婦女仍是文盲，要找到接生婆和產婦的聲音有如大海撈針，但助產士卻是一批受過教育的新女性，要發掘她們的聲音並非不可能。由於欠缺這方面的資料，讀者既無法知悉這群助產士如何審視自己的專業地位，也無從得知作為受益者的產婦和受害者的接生婆如何評價現代化分娩，更加不能感受到國家機器透過分娩技術入侵個人生活甚至控制身體的威力。如能在這方面多加闡述，將可增加分娩標準化造就出新女性以及推進社會現代性的說服力。

盧淑櫻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仇鹿鳴，《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6，337頁。**

仇鹿鳴《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一書（以下簡稱仇著）是作者在復旦大學2008年度博士論文基礎上形成的一部著作。韓昇教授在書的序言中寫到：「我讀過此書多遍，所以敢說這本書一定是研究魏晉史必須一讀

的著作」。魏晉之際的政治史向來是中古史研究領域的經典論題之一，前人為此作出了艱辛的努力，碩果累累。這些研究主要受到了陳寅恪先生所提出的政治集團分析範式的影響。陳寅恪對於魏晉兩代統治階級性質的分析，認為魏晉之際的政治變革是東漢末年士人與宦官鬥爭的延續。其次，司馬氏篡魏實質上是儒家大族對閹宦寒門的勝利。第三，西晉之亡實乃綜合了儒家大族及法家寒族之劣點所造成。日本魏晉政治史研究主要也是圍繞兩大集團的鬥爭來展開，這兩大集團的一方是代表了東漢末年清流的司馬氏派，另一方則是鄉土血緣關係接近曹魏帝室的曹氏派。仇鹿鳴關於魏晉嬗代的一系列具體政治事件的實證研究，對陳寅恪的政治史敘述模式和理論框架提出了相當的挑戰。

本書的緒論主要進行了學術史的回顧、史料述略、研究概況及全書佈局的介紹與引入，闡述了陳寅恪階級升降理論和政治集團分析模式，對以往研究範式所存在的弊病進行了分析與批判。第一章分析漢魏時代司馬氏家族通過借助河內郡的鄉里網絡關係在漢末亂世中崛起的歷史進程，隨着司馬氏在曹魏政權中地位提高，司馬氏逐漸從政治網絡中的托庇者轉變為庇護者，這標誌着司馬家族從地方性大族發展為在曹魏政治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政治家族。第二章對魏晉嬗代的相關史事進行了深入論述，高平陵之變事實上得到了曹魏政權中的元老和功臣的大力支持。其次，司馬師克服了東關慘敗所造成的政治危機，掃除中央與地方的反對勢力，建立了魏晉嬗代的政治力量，齊王攸繼承天下的合法性便是源於司馬師之功業。其三，淮南三叛的研究往往套以曹馬之爭的框架，作者揭示了淮南諸將內部的矛盾與分歧。其四，作者對伐蜀之役的背景以及人事安排進行了探討，指出鍾會與鄧艾爭功的實質是功臣子弟與出身低微的事功型官吏之間的衝突。第三章主要分析司馬氏集團的形成過程和矛盾的衍生。司馬氏家族在亡魏成晉的過程中既要鎮壓忠於曹氏力量的反抗，同時又要維持曹魏政治網絡的穩定，以陳泰、司馬孚為代表的魏晉士人面臨着複雜的家國糾結和公私矛盾。司馬氏對石苞從信任到不信任的轉變，反映了司馬氏集團內部權力結構的動態演變。賈充雖然是政治核心圈內的重要人物，但他與武帝之間存在着互相仰賴又相互戒備的關係。第四章揭示了咸寧二年（276）對武帝政治以及西晉政治的轉折意義。咸寧二年（276），武帝引入外戚楊氏，改變了西晉政治的格局，建立了宗室、功臣、外戚三方制衡的權力結構。齊王攸之死造成了同情齊王攸的多數派與支持武帝的少數派，導致武帝所倚重的外戚楊氏家族失去了朝中官僚的支持與信任，武帝所構建的政治格局被打破。結語部份對「中古士族政

治是如何形成的」這一問題進行了回應，作者認為曹魏的政治結構被司馬氏繼承下來，西晉官僚階層已經形成了一個緊密的政治利益共同體。五胡十六國的動亂中斷了士族化的進程，在中央權力崩潰後，擁有鄉里勢力的大族成為了地方政治的主導，區域性的割據政權都必須與地方大族合作。而在南方，東晉的門閥政治至少有兩個重要特徵源於西晉，一個是具有累世仕宦傾向的政治群體，另一個是以玄學清談為共同文化特徵的官僚階層。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魏晉時期實為中古士族政治的形成期。

仇著結構鮮明，論點清晰，允為魏晉之際政治史研究的佳作。全書的主要特點如下：首先，作者沒有盲目使用未經明確界定的政治集團、黨派分野之類的概念，而是採取政治史與家族史研究相結合的方式，在政治史的脈絡中探討西晉權力結構的演變歷程，在家族史的視角下考察魏晉大族間的政治婚姻交往網絡，本書的每個章節圍繞一至兩位核心歷史人物展開個案式的剖析，對於政治史的研究層次從集團深入到了個人。其次，正史文獻的不足以及新史料的缺乏是魏晉政治史研究的瓶頸，仇著在如何充分挖掘史料的深層涵義上也作了一個極佳的典範。仇著充分考慮歷史記載形成過程中複雜的政治文化因素，分析史料記載者的不同立場，反映魏晉政治史的複雜性和多面性。第三，陳寅恪曾提出「外族盛衰之連環性與內政之關係」的分析理路，仇著受此影響，注重多個因素尤其是內政、外交對政治事件的共同作用。最後，以往的研究習慣將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司馬炎視為一個整體，而於其中的差異較少注目，將司馬氏集團內部作動態的展示也是仇著的一個貢獻。

仇著的研究對陳寅恪的不少具體論斷提出了質疑和修正，是對政治集團理論的一次重要衝擊。但是仇著最後並沒有樹立一個可以替代陳氏理論的新範式，作者擯棄了曹馬之爭、儒法之爭的窠臼，但新的政治集團又相繼浮出水面，「二士爭功」所體現的司馬氏功臣子弟與出身低微的事功型官員之間的矛盾，咸寧二年（276）形成的外戚、宗室、功臣三方制衡的政治格局，仇著仍然無法擺脫政治集團理論強大的吸附力，如依其對陳氏理論批判的方法，則我們似乎要進一步盤查這些新的集團內部的分野與複雜的政治面向，不放棄使用政治集團理論，則永遠無法擺脫如何劃分集團邊界的難題。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放棄使用政治集團分析理論，這樣就可以徹底治癒釐定政治集團邊界的頑疾；二，如果不放棄，也許我們應該對陳氏的政治集團理論進行新的定位，重新思考陳氏理論的有效範圍和失效區域，陳寅恪的政治集團理論在哪些層面的適度運用可以取得理想的研究成果，而在哪

些方面的濫用會遮蔽中古歷史發展的曲折性和複雜性。像仇著這樣既重視對魏晉之際的人事關係、政治事件進行大量實證研究，又在此基礎上對政治集團分析理論加以深入反思，無疑是中古政治史研究的一條新出路。

王晶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

**孫英剛，《神文時代：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486頁。**

陰陽災異、星占氣象，對當代的普通人而言，多屬無稽鬼魅的迷信之談。甚而至於，大部分史學研究者在讀到有關讖緯術數、形法堪輿的文字時，亦難解其理，或只能視而不見，或謂其穿鑿附會。孫英剛的新著《神文時代：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獨闢蹊徑，放下了今人面對古代知識時的傲慢態度，從古人的視角出發，透過細緻的史實考證，為我們揭櫫讖緯、術數知識的內在邏輯，展示它們在中古政治世界中的重要作用。

全書正文共分為四個部份。緒論、上篇「天命與預言」、中篇「祥瑞與災異」、下篇「曆數與曆術」。緒論五個小節的標題——「神文與人文」、「天命與天道」、「預言與災祥」、「曆術與曆數」、「烏托邦與救世主」，實為五組關鍵字，提示了本書的要義。

「神文與人文」，可以說是本書的解題。作者認為，對政治合法性的論證，大體可分為神文與人文兩種路徑。神文，即統治的合法性來自天或神；而人文，主張政治的合法性來自人本身。本書研究的中古時期，即從漢至隋唐，位居政府思想資源核心的儒學，大量採用讖緯、術數作為天人感應的論證工具，實際未脫神文主義的總體構架，故本書以「神文時代」總括此時期的政治特徵。

神文時代的統治合法性又以何種形式表述呢？第二節的標題「天命與天道」便是對這一問題的回答。神文時代，統治合法性的最有力論證是得天命，即統治得到上天的認可。得天命者，必須理解自然的運行規律，亦即天道，應向大眾證明自己的行為與天道一致。在政治實踐中，基於實力競逐取得的權力，仍需使民眾相信權力與天命之間確實存在着關聯。

「預言與災祥」、「曆數與曆術」、「烏托邦與救世主」，緒論的後三